

学性质会带来何种学术上的增量或减量？其四，融合党史和党建为一个学科，在理论上可以找出种种理由来证明它的可能性，但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上是否具备可操作性？人们是否可以写出一种严格的符合“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术文本？其五，是否可以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的范畴前提下，分别进行党史和党建的研究，在学理上各自为战，以此来避免学科融合带来的学理矛盾？其六，在承认跨学科合理性的前提下，是否可以分别建构党史和党建的学术理论？它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又应当具有何种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特色？等等。

以上这些问题之所以值得思考，是因为可举一个摆在眼前的实际问题为证。譬如，某个党史类的学术期刊（党建类的学术期刊也一样），是否刊载党建类型的文章就成为问题，如不刊载，那么如何因应“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学科建设需要？如果刊载，那么，期刊的历史学专业性质就可能遭到质疑，甚至降低其中的史学意蕴的学术质量，如此学界可以接受吗？另外，是否可以进行创新性转化，发展出一种既体现党史特色又体现党建特色的学术类型的书写文本，来满足党史和党建被整合为一个学科范畴的需要？这个追问，可能是臆想也可能不是。假如有某个机构创办名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期刊，是否就有机会承载这种文本类型的文章呢？现实的学科问题需要给出科学的解释，这就有待来日“中共党史党建学”在学科理论与方法上的深入探索了。

（本文作者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教授）

中共党史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学科互动^{*}

陈 峰

随着“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设置，中共党史研究独立为一级学科的设计正在逐步落地。党史研究是一个特殊学科，一方面与通行的学科体系不相匹配，一方面又处在政治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三大学科的交汇点上。党史研究独立之后该往何处去，如何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世所公认的学科？这是今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笔者当然无力对此进行全面阐述，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党史研究应当将学术化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一级学科的建立为学术化打开了更大的空间，而学术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史学化、向历史学科靠拢。党史研究首先应当遵循历史学的基本规范，构筑自己的学科底线，借以清除和抗衡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这是党史研究学术化的第一步。历史学是党史研究走向学术化之路最重要的盟友，中共党史与历史学两大学科开展深度合作变得更加迫切而必要。基于此，笔者尝试就以往较少留意的中共党史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学科互动关系做一初步讨论。

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中共党史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对话之旅正在开启。表面看来，二者之间似乎没有多少交集。二者在习惯上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长期以来，中共党史曾作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而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则属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下面的一个研究方向。政治学与历史学两大学科之间的鸿沟造成了二者的分野。尽管近年来中共党史回归历史学的呼声颇高，但“党史非史”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中共党史具有与生俱来的政治性基因。在很多场合，党史被作为党的政治理论的一部分来对待，承担着政治宣传功能，这种状况还将继续存在下去。由于研究理念、风格、规范及路径的一系列差异，从整体上说，党史界与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的调查、整理和研究”（18ZDA169）的阶段性成果。

史学界仍然比较隔膜，缺少共同语言和必要合作。归根结底，中共党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分隔，主要在于学科分界及职能不同。

然而，不得不承认，中共党史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两类研究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关联，绝非“道不同，不相为谋”。中共党史虽长时间归属政治学科，但其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着强大的辐射力，对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研究发挥着制导作用。中共党史的分期框架、路线斗争的叙事模式一度对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强大的同化和形塑作用。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地位，造成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交叉重叠，更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核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虽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中作为学术史的一个子集，却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些学者甚至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直接等同于中共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虽不完全同步，却也相互呼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政治上孕育了中国共产党，在学术上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二者在理论上是同体同源的。从人员上说，中共学者构成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主体，尽管在某些历史时期存在大量党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同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如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是由中共学者缔造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往往是革命者与学者一身二任。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就不是一种纯粹的、超然物外的学术，而是作为党的理论文化战线、党的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存在的。最典型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声势浩大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其直接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但归根结底，社会史论战是为解答当时面临的革命前途和方向问题而展开的，对中共革命方略的制定尤为切要。抗战后期中共发起的“学术中国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熟完善也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的反右派斗争、“大跃进”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等则导致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步步走向教条化、极端化。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与中共党史是休戚相关的。

也正因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书写长期处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话语的笼罩之下，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获得了一个非常宽广的视界，将史学演化与社会政治的变动整合起来，而不再局限于学术嬗变的内在理路，不再仅仅就学术论学术，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缺乏全面、细致、深入的把握。与此同时，党史研究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和不足也会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比如突出路线斗争的做法也被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所仿效，一味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斗争中成长、在斗争中发展，导致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他学派共存互补的一面在无意中被忽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分期也大体套用了中共党史的分期，对学术自身发展的阶段性、连续性认识不足；等等。

今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要有所突破和创新，是不是必须与党史研究脱钩、划清“楚河汉界”呢？显然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与中共党史的天然联系是无法被人为割断的，刻意回避二者之间的联系只会妨碍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准确认知。其实，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造成不良影响、产生误导的是那种陈旧僵化的党史研究模式，要抛弃、要清除的是陈旧的研究模式，而不是与党史研究本身分道扬镳。相反，党史研究的推陈出新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也能够起到解放和推动的作用，为后者开启更大的自由空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应当顺势而为，积极借取党史研究的新视角、新成果推进自身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一些研究者将近些年来党史研究的趋势概括为学术化^①。这就是确认党史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学术研究，以求真为宗旨，注重实证。越来越多的学者认

^① 比如杨奎松《50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吴志军《学术化传统的生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头三年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4期；谢辉元《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学科理论的重建与进步》，《北京党史》2014年第6期；汪兵《史学范式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大理大学学报》2018年第7期；等等。

同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属性，推动党史研究向史学靠拢，主张研究者应具备史家的功力与眼光。历史学成为党史研究的源头活水，党史研究的史学化实质上就是学术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也正在与党史研究一道走向学术化。党史研究从政治学逐步转向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发展方向则是融入学术史研究的主流，成为学术史领域的一支生力军。

在学术化的共同趋势下，中共党史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应当缔结一种平等的互动对流关系，二者关系的理想状态是“和而不同”，既各自保持相对独立性，又能互相吸收对方之长。中共党史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提供一种视域、一个背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也为中共党史增加一种向度、一个环节。二者的结合对完整认识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引发的社会组织和思想文化上的结构性变革是大有益处的。

党史研究的一些新思考新创获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具有启发性。长期制约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一些关键性认识往往来源于党史研究，党史研究的新陈代谢则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展示了更多的可能性。

首先，中共党史人物研究的相关进展，将直接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认识。一些中共理论家往往涉足马克思主义史学，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作出贡献，如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陈伯达、何干之等。例如，近年来关于李大钊的研究，除他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的活动之外，更关注到其与进化论、互助论、调和论、无政府主义等五四时期流行的各种思想的关联，展示出思想的丰富和多元，不但有助于观察和理解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活动，而且能够为李大钊史学与此以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差异提供一种说明。

其次，党史研究中关于一定时期党内斗争、党内分歧的新认识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有所助益。随着对陈独秀、刘仁静、李季与托派的关系研究的深入，社会史论战时期中国托派的史学观点也得到更全面的分析。以往那种把苏联托洛茨基的理论与中国托派的主张简单等同起来的做法得到纠正，某人一入托派便遭一笔抹杀的现象也有所改观。目前学者已多能正视陈独秀、李季等在成为托派之前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立下的功绩，细致辨析他们成为托派之后与中共干部派在理论上的异同，不再是简单地一批了之。这较之以往那种标签化、脸谱化的处理方式无疑是大大进步了。无论如何，托派的史学研究特别是关于中国社会史的探讨毕竟是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下进行的，即便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一条岔路甚或歧途也是值得进行反思和总结的。^①

再次，党史研究对国共关系复杂性的揭示，也在改变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等同于中共史学的思路。当前党史研究的一大突破，就是超越了以往那种二元对立思维和意识，对中共与其他政派的关系主要是国共关系有了更理性、更深层的认识，把握到他们之间的关联与互动。以往将马克思主义史学当作中共史学，强调与非中共背景的史学派别的斗争，而忽视和掩盖了一些非中共人士曾经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有所贡献的史事。例如，20世纪20年代《建设》杂志时期的胡汉民曾大力介绍传播唯物史观，还尝试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哲学史，与胡适展开井田制有无问题的辩论。这与李大钊构建马克思主义史学几乎处于同一时期。改组派时期的陶希圣对中国社会史研究具有开拓之功，被当时学术界推许为与郭沫若并列的两位大师之一。这也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构建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从单一的党派视野出发是难以达到全面真切的认识的。

目前，党史研究早已不再限于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已发展成为一个涵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综合性领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与中共党史有交叠，大体上可视为中共党史的冰山一角，特别是中共人物的史学活动也属于党史研究的范畴。考察中共在史学方面的建设和作为，可以为党史研究提供一个侧面。与其他政派不同，中共尤其重视史学。李大钊等早期中共领袖自不必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号召开历史研究特别是近代史研究，并作出具体指示，要求“对于近百年

^① 最近的研究可参见李红岩《托派的中国社会性质论》，《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4期。

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①，还对何干之、范文澜、陈伯达、吴晗等人的历史研究工作尤多关心和引导。另一位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则主持撰写过《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1953年，中共中央设立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增设历史研究所以及创办《历史研究》杂志。这种对史学的重视和利用彰显了中共身上的某种特质，一种浓厚的历史气质。为什么中共对史学情有独钟？这是值得党史研究者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中共党史是历史研究中难度最大的一个领域。如何平衡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是研究者面临的一大考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同样如此。从宏观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运动具有密切关联。一定的文化政策、权威论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强烈的导向作用，既提供了驱动力，也构成了规训和约束。从微观来看，研究者的政治归属与思想定位直接影响和塑造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状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生成和演变既是学术自身发展的产物，也是一个学术与政治、社会互动共生的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在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时所采用的立场和策略，或可成为党史研究的有益借鉴。

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最为接近的当属中共党史学术史，前者能为后者的研究提供直接参照。中共党史学术史是中共党史开展学科建设、完善学科体系的产物。它遵循一般学术史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评述党史研究的学者和作品，梳理党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总结党史研究的特点和成败得失^②；或如有研究者所强调的那样，其主要工作是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探究党史研究学术化理路的生成与演化^③。无论如何，虽然中共党史学术史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处理的对象不同，但研究方法相似。从事中共党史学术史研究应当有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方面的训练。中共党史学术史研究最初的思路和框架主要来自史学史学科。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所采用的新路径和新方法，也完全可以移用至中共党史。例如，中共党史学术史研究可尽量运用书信、日记等文献，探查学者的人际网络，关注机构运作、刊物编辑出版等制度层面的内容，如此则可迎头赶上，与学术史研究的新潮流接轨。

总之，尽管学科有别、关怀相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仍可以纳入党史研究的视野，作为中共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党史研究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关注的内容之一。二者存在一种事实上的交叉和相辅相成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若能积极吸收党史研究的新成果，将有望实现关键性的突破。党史研究若能共享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新进展，也有助于增加一种学术史的关怀，提升自身的学术厚度和理论深度。二者不断从对方身上汲取创新的动能，互相激发，形成良性循环。不过，基本前提是中共党史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都应当冲破旧规，锐意求变，秉持开放包容的姿态，以学术化为根本旨趣。背离了这一前提，再多努力也是徒劳。

(本文作者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国历史研究院左玉河工作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 吴志军)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2页。

② 参见于文善《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述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③ 参见吴志军《学术史：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史学书写》，《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5期《党史研究学术史理论三题》，《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期。